

《大学》的性质教案

课程名称	四书五经导读	课程代码	
使用教材名称、编著者、出版社			
授课对象	所有专业 一 年 级 班		
课 题	《大学》的性质		
教学目的 基本要求	教学目的： 了解《大学》的性质 基本要求： 三纲领、八条目		
教学重点	《大学》的性质		
教学难点	《大学》的性质		
教 法 教 具 课 件	教法：讲授法、文献法、问答法 教具：多媒体设备、板书 课件：《大学》的性质		

教学内容及进程:

一、导入

《大学》本是《礼记》中的第42篇，主要讲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。北宋以前，与《礼记》其他篇章地位相同，并无特殊之处。后经过程颢、程颐兄弟的大力尊崇，南宋时朱熹又作《大学章句》，并和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称“四书”，地位才逐渐显赫。宋、元之后，《大学》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，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，对做人、处事、治国有深刻的启迪性。

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分为经、传两部分，经阐述的是孔子的意思，最为重要，传则是用来解经的，是曾子的门人整理完成的。经共一章，原文如下：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其中，开篇的三句，朱熹称为“三纲领”，这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。随后从格物、致知，一直到治国、平天下，共八条，他称之为“八条目”，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和次序。

二、大学与太学

在《大学章句》开篇注释：“大，旧音泰，今读如字。”意思是大学在以前曾经读作“泰”，现在也可以直接读大。泰与太，是通假字，都是形容大的意思，泰山在古书经常写成太山。因此，大

补充说明

参考资料：

朱熹：《四书集注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05年。

学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太学。

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郑玄为三礼作注，解释《大学》的篇名时说“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”，认为《大学》主要是讲博学，最终目标是为政。

朱熹的解释与郑玄不同，他认为：“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”大学这本书，是古代的太学所以“教人之法”。明末的王夫之进一步说明“大人者，成人也”。古人认为15岁以上进大学，是成人，15岁以下读小学，还是少年。

《礼记》中的《学记》专门谈教育，其中提到大学之礼、大学之道，还有大学之法、大学之教，认为大学之道是要让“近者说服，而远者怀之，此大学之道也”，这与《大学》开篇的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的论述非常一致，侧重点都不是博学，而是与太学这个教育机构相关。古代在都城设立大学，西周时期叫做国学，是当时设立的一种最高规格的教育学校。所以，“大学”是讨论古代大学教育之法、教育之礼、教育之道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朱熹较之郑玄，解释更为贴切。

关于大学和小学所学内容的差别，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云：

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，学小艺焉，履小节焉。束发而就大学，学大艺焉，履大节焉。

小学和大学的区别，小学学小艺，大学学大艺。什么是小艺呢？朱熹在《大学章句序》中说：

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

进入大学之后，“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”，所学内容与小学迥然不同，层次更高。

因此，可以说大学之道，就是大学的教育之道。

三、《大学》的作者

隋唐以前，《大学》只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无人关注其作者问题。宋代以后，随着《大学》地位的提升，作者问题也成为学术

界关注的问题。

北宋程颢、程颐兄弟认为,《大学》是“孔氏之遗言”,是孔子遗留下来的话,说法比较笼统。南宋朱熹在编“四书”时,将《大学》重新编排整理,分为“经”一章,“传”十章。并且提出:“经一章盖孔子之言,而曾子述之;其传十章,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”“经”是孔子的话,由曾子记录下来;“传”是曾子解释“经”的话,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。

朱熹之所以这么说,是有依据的。他认为:“正经辞约礼备,言近指远,非圣人不能及也。”经虽然只有一章,但是用辞很简约,道理却很完备,似乎说得很近,包含的意思却非常深远,“非圣人不能及也”,这种境界,只有圣人才能达到。关于解释经的传文,他说:“至于传文,或引曾子之言,而又多与《中庸》《孟子》者合,则之成于曾氏门人之手。”传文里面只引用了曾子的话,而且内容又与《中庸》《孟子》相合,《中庸》《孟子》的作者是子思、孟子,他们与曾子的思想属于同一学派,思想一致。所以,朱熹认为“成于曾氏门人之手”。

这个观点对后代影响很大。

宋末元初,黎立武作《大学本旨》,认为朱熹所谓“经”的部分是曾皙的话,其他为曾参的解释。

明朝崇祯年间,任国子祭酒的谭贞默在《三经见圣编·序》中说:子思的书称作《中庸》《大学》的,其实是一部《中庸》,因为《大学》就是《中庸》的后小半,所以平时所指的《四书》实际上是《三书》。

清代学者俞正燮认为《大学》是汉代《诗》《书》博士杂集的。蒋伯潜也认为《大学》成书于汉代。他认为,从《论语》到战国诸子文体演变来看,《大学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比较,不但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完全为记言体不同,而且与《中庸》半为记言体半为议论体也不一样,已是一篇组织严密的论文,明显属于后出的作品。今人杨天宇也否定《大学》为曾子所作,他在《礼记译

注》中说：朱熹“抬出孔子和曾子，不过为了借经学以说理事，欲尊大其学而已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。本篇的作者究系何人，今实不可考。”

历史有时候最善于开玩笑。多少代人的努力，付出无数的心血，往往却发现事情又回到原点。在《大学》作者问题上，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佐证。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，其中有一篇《五行》。经过专家考证，帛书本的《五行》有“经”有“传”，“经”的部分是子思的话，“传”的部分是子思的再传学生世硕所作。1993年，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，其中也有《五行》。但竹简本《五行》却有“经”无“传”。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：“以帛书本论，经传前后连贯，其体例和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十分近似。《大学》一篇文字有错乱脱漏之处，宋代学者特别是朱子，曾做过细致的分析整理，将篇内经传区别开来。”他认为朱熹的观点是正确的，《大学》“传”的部分是曾子解释“经”的话，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。其依据是，“传文明记有‘曾子曰’，而曾子的话又和整个传文不能分割。按战国时著书统例，这是曾子门人记录曾子的论点，和孟子著书有与其弟子讨论相同，所以《大学》的传应认为曾子作品。”

考古发现证实了八百年前朱熹的先见之明。

有学者进一步研究曾子思想与《大学》的关系，发现二者存在很多相同之处。比如，《大学》提倡人伦秩序，认为“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”，尤以孝悌为最重，以为这种家庭伦理能够扩展而成为治国为政之道。而曾子就是以其孝道理论著称于世，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孝道理论亦与治国为政相关。此外，在忠恕之道方面，曾子说：“君子己善，亦乐人之善也；己能，亦乐人之能也；己虽不能，亦不以援人。”（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》）与《大学》中的“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如出一辙。